

## 案例一

### Like father, not like son

#### 有其父，未必有其子

### Measuring social mobility

#### 考察社会阶层变动

霍瑞修·爱尔杰的著名小说《衣衫破烂的迪克》，讲述了主人公迪克，一个靠擦皮鞋维持生计的流浪儿，依靠勤奋诚实的品质，凭借学习三项基本能力——“阅读、写作、算术”——而改变命运的故事。他成功的标志是一套西装，一份在贸易公司当职员的工作，和一个新名字“理查德·亨特先生”。

最近，多位经济学家采用了比“迪克”成功更加复杂精细的标准来考察社会阶层的变化情况。比如纵观一生，是白手起家还是家道中落；或是比较代际差异，看看与儿女们比起父母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既从绝对角度出发，比较父母与子女的贫富状况；也用相对眼光观察在社会收入阶梯上，子女与父母的相互位置。

今天，各个国家普遍发展迅速，经济变化呈现出许多绝对性向上趋势。在新兴经济体内，子女们几乎无一例外比父母挣得更多钱。即使在增长缓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美国，大部分人都比他们的父辈表现出色：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近期一次研究发现，美国 84% 的成年人拥有比父母更高的收入。然而，对于精英阶层，特别是在用几代人作比较时，以相对变化作为标准更加重要。经济历史学家在得出这些指标的过程中运用了特别的技巧，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克拉克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戴维和尼尔·柯明斯，对具有罕见姓氏的家族进行追踪。他们通过查阅英国自 1800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记录，挑选出诸如巴扎尔格特，莱斯查莱斯这样的家族，并对他们各自家族中在像牛津和剑桥这样顶级学府里学习过的后辈做了比较。按理来说，当今社会拥有广泛的平等机遇的社会，父母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对儿女的影响应微不足道。结果却表明，两百年来社会的变化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罕见姓氏家族在 1800 年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与今天的后代十分相关。个人家庭财富长期状况可以依靠统计调查进行跟踪。据此，经济学家估算了父母经济地位对成年子女收入和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进而产生的系数，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做“代际收入弹性”，它成为了今天衡量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指标。该系数越高，则社会阶层间变化越小。

用这种方法可以看出北欧社会变动幅度非常明显。仅有约 20% 父母的相对富裕或贫穷的境况“遗传”给了孩子。相较之下，中国则相当稳定：同代人的收入差距，有 60% 都延续到了下一代。最令人吃惊的还是美国，从大概一半人的收入状况能够推断出他们成年子女的收入，这个比例远超过加拿大，也甚于除了意大利和

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从这个衡量结果来看，美国社会阶层变动幅度远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衡量经济机会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找出由不可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性占多大比例，比如种族、性别、出生地、父母的教育和职业等。如果这个比例较小，就说明该国的机会公平性较好。

这种“机会不平等指数”首先由世界银行的弗朗西斯科提出，现今已运用于 40 个国家。从调查结果来看，挪威属于一个极端，只有 2%——是很低的比例——说明不平等性仅仅是由出生偶然性造成。另一个极端在巴西，有三分之一的高收入源于背景优势。美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巴西。（见图表 1）



经济学者们同样运用了机会平等指数来衡量儿童接受基本服务的差别，这些服务将影响到他们的未来，比如教育或自来水的使用。世界银行发明了多项指标，通过对比接受服务的不平等性来进行整体调整。像南非，卫生设施的总体使用情况与尼加拉瓜具有相同比例。不过一旦你调整了种族差异，针对卫生设施的“人类机遇指数”就要降低许多。

选自 The Economist Oct 13<sup>th</sup>, 2012

案例二

Nomencracy 名门望族的天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一个姓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代际社会流动程度的线索，结果却令人沮丧

渥太华大学迈尔斯·克拉克认为，在美国、英国等一些地方，某一代人有 50% 左右的收入差距要归因于上一代人（在平等主义更为盛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一数值要小于 30%）。

即便如此，这样描绘的社会图景也太过乐观了。迈尔斯的著作参考了最近几项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比较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收入水平。这样做既是出于研究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涵盖三代人或更多代人的可靠数据较少。不过，仅凭两代人的有限数据可能会对社会流动性做出过高估计。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指出，仅在一代人的范围内，富家子弟免不了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不幸，其他孩子则会因为有志慈善事业等种种独特原因选择低酬工作。诸如此类的统计干扰使得社会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流动易变。而由此推断出的几代人间的流动率会让我们以为从长远上看，社会的机会平等图景一片光明。格雷戈里用研究表明，家族史的影响会大得多，而且其作用时间会持续更久。父亲很关键，但祖父、曾祖父同样很关键。事实上，可能要花上三五百年，才能使上流家庭与普通家庭的后代在各个收入阶层上出现的几率相同。

为了解决可靠数据不足的问题，格雷戈里选择从罕见姓氏中收集信息。要想从姓氏中剥茧抽丝，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方法是寻找某些特定姓氏同优越的经济状况在历史上的联系。例如在 2012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格雷戈里分析了瑞典的名门望族。那些非同寻常的 17 世纪贵族姓氏以及 18 世纪某些家学渊源的瑞典人传承的拉丁姓氏（比如像林奈姓）在瑞典社会中都非常稀有。格雷戈里发现，这些家族的子弟在精英阶层中占有很高比例，通过追寻这一线索，格雷戈里计算出了长期的社会流动率。

直至 2011 年，这些贵族姓氏的子孙仍频频出现在律师这样代表高社会阶层的队伍中，且出现比例几乎是其所占人口比例的六倍。格雷戈里认为，即使是在以社会流动良好著称的瑞典，在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也有约 70%-80% 的家族社会地位能得以代代相传。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相似的手段，揭示了 19 世纪西班牙以及中国民国初年可比较的社会留滞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承的优势都清晰可见。

第二种方法研究的是罕见姓氏于过去某一个时间点在上流人群或普通人群中比例超额的几率。比如说，很少有英国人姓米克尔思韦特，而在 1800 年时，姓米克尔思韦特的人往往都很富有，你就可以通过研究米克尔思韦特家族多久才失去这种“必然富裕”的魔力来计量长时间的社会流动性。在一篇格雷戈里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尼尔·康明斯共同合作的论文中，两人从 19 世纪财产遗嘱文件中收集数据，将罕见姓氏划分成不同的富裕级别，再用相似类型的数据探寻在接下来的年月

中，这些富裕程度不同的罕见姓氏家族能变成什么样的“寻常百姓家”。结果他们再一次证实，约 70%-80% 的经济优势似乎还是能代代相传的。

格雷戈里总结认为，深层次的社会流动率不仅低，而且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鲜有变动，令人惊讶。比如英国对中学教育的普及几乎未能影响到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率。格雷戈里指出，这种社会的持续不变性表明，社会流动率低可能是因为深层次的“社会竞争能力”存在差距。这种竞争能力可以潜在地遗传，而且人们又喜欢和性格相似、能力相当的人交往，这么一来，这一竞争能力又进一步增强。

这种机会只能听天由命的观点听起来让人沮丧。有些研究运用了现在仅有的少数多代际数据，得出的结果要稍好一些。一项针对瑞典城市马尔默的研究分析了个别家庭四代人的数据，发现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同其曾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关系，同时也发现了更多证据，证明仅探讨一代人会导致对社会流动性的过高估计。格雷戈里将同样的数据用于姓氏氏族分析，计算得出马尔默 60% 的收入差距是因为前几辈人的经济优势——这比他算出的 70-80% 的比率要低，但还是高于迈尔斯单一代际的估算结果。

惠顿学院的贾森·龙和西北大学的约瑟夫·费里埃用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番视角。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详细查阅了美英两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一面记下有子女家庭的状况，同时追踪记下这些孩子成家立业后的家庭状况，以此建立起几代人的数据资料。对英美两国三代人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代人的高收入水平会使至少两代人收益。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打破社会一成不变的枷锁也并非不可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在 20 世纪中叶趋近，但在 19 世纪，美国社会明显要比英国更易变动更迭。过去牢牢掌控着现在，但如果环境适宜，这种控制力显然也可以人为减弱。

选自 The Economist Feb 9<sup>th</sup> 2013

### 案例三

#### 二代收入差距背后：父母身份多数决定子女收入地位

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李宏彬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今年5月成书，论文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

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李宏彬参与了前期设计和后期结果讨论的全过程。从调查到出论文，持续了三年。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

他翻开271页，是一篇题为《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的论文。论文的结果是：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公务人员子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显著的工资溢价的情况。

李宏彬说：“这篇写得很隐讳。”

他们只能推测，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母与估值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也可能是父母有着更好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他们也排除了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这些子女学习成绩更好、个人素质更高而直接影响了工资高?是不是他们在大学期间通过学生干部和技术证书等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而影响了工资……研究组给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经济公式发现，这些可观测到的学生自己的特征并不能解释这种工资溢价。相反，“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者)无法观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观察到。”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因素与其父母的政治资本相关。

调查发现，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户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甚至更大了。做这份研究，持续了三年。李宏彬说，“现在还在不断出论文。这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话题，做这个调查，是想从学术上做一次探讨，对人们熟悉的现象做一些科学分析，数据设计，找到一些数据的证据而已。”

这的确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话题。

201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一篇名为《为二代创建公平的竞技场》的文章说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阶层差别,换代之际,恰恰形成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有的是背影.....”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让他自己都感到尴尬的是,同样是“穷二代”的自己,一路拼搏,读完了博士,依旧没有实现上层梦,“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能怎么办呢?起点就不公平。”

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有趣的是,在李宏彬和他的同事的调查中,公务人员子女被公务员录取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上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这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选自《中国周刊》2012-11-20

请阅读以上三个案例,围绕下面的问题,写一个A4纸一页以内的memo,并于本周六(3月9日)晚上24点前发到相应的小课助教邮箱,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经原小课第3周memo”

(1)案例中提到的衡量社会阶层变动(即经济流动性)的指标有哪些?你还能想到其它的衡量标准吗?一个经济流动性更强的社会是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根据三种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逐一阐述你的看法。

(2)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代际流动性?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对于中国来讲,你认为哪些因素是重要的?你认为在中国如何提高代际流动性?

(3)你的父母是否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生?你估计如果某个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生,他们的孩子是大学生的概率是多少?(无需论证,根据你的经验回答即可)